



前言

我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，也不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明星。是什么促使我提起笔来写这本自传呢？我也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。

我的父亲吴本豪出生于辛亥革命那一年。我的母亲罗曦出生于共产党成立那一年。而我则生于中日战争绞杀的一九四三年。也许正是这些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事件，让我和我家人的人生，充满着政治色彩。如果说，人生有百味，我尝过九十九种；如果说，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生故事，那我的人生经历就是系这一百个故事于一身。这七十年来风口浪尖的岁月，造就了我独特的人生经历，有时像一条崎岖不平的泥泞小道，充满荆棘；有时像一帆风顺的康庄大道，充满阳光。历史在我的人生轨道上，烙下了一个又一个不可磨灭的脚印。可以说，我的故事，像一幅历史的画卷，是独一无二的。

先说说我的事业。我参与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，是五八中队最年轻的成员之一，那年我才十七岁。我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，参与了中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，我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，从北京发到瑞士的电子邮件，被列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上的第一条。我不仅参与并观测到北京谱仪上第一个J/Psi粒子，而且是CMS探测器上观察到Higgs粒子的主要参与者之一。人们常会问，原子弹、人造卫星、正负电子对撞机、互联网等等，似乎是完全不同的领域，如何会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发生呢？这种阴错阳差的巧合，在这世界上，也许只会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。这完全是中国当时特定条件下，畸形社会的产物。

如果说我的事业非常辉煌，那么我当时的职业则显得非常可笑。我当过工人，农民，放过羊，喂过猪，淘过粪，盖过房子，当过火车装



卸工，炸过山洞……人们怎么也不能把我的职业与我的事业联系起来，这就是我的回忆录的特别之处。

如果用我住过的房子来描写我的人生轨迹，也是非常有趣的。我出生在上海一个石库门的弄堂里。那是一个带阁楼的房子，一家人挤在一起。我记得我从小是抱着外祖母裹着的小脚睡觉的。后来搬到一幢花园别墅里，我第一次用上了自来水。随着母亲工作的调离，我们搬到了一座黄楼，它在巨鹿路上。我的弟弟写过一篇关于这座黄楼的文章，发表后，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。其实，我的弟弟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写，那就是位于巨鹿路的菜市场，曾经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的一个大舞台。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了这难忘的一幕。一九六六年后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全国上下一片混乱。我的家也跟着遇到巨大的灾难。原来虽然不大，但是非常温暖的黄楼，人去楼空。兄弟姐妹被赶到全国各地。从此以后，我住过的地方，难以想象。我住过原始人的洞穴、人造的窑洞、土胚房、铁皮房、茅草房、牛舍、帐篷、蒙古包、兵营……最难以想象的是，我曾住过这样的窑洞：里面一个炕，全家躺在一个炕上，而窑洞的最里面是祖先的陵墓碑位。每天晚上，老鼠东奔西窜，甚至爬到我的身上。即使回到北京，开始我也是住在大教室里，后来才住进筒子楼。现在，当我住在大房子里望着高高的天花板，躺在席梦思床上，过去的回忆如梦一样，不堪回首。

在七十年的岁月里，我经历了许多的荣荣辱辱与大起大落。在十六岁那年，我以优秀中学生代表的身份，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。半个世纪以后，在美国芝加哥，我以华人代表的身份，受到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。与此同时，我还受到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这些经历，可以说非常荣耀。但是，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，我又被点名为重点批判对象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，我疯狂地鼓吹文化大革命，因为我感到那些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的人，应该被打倒。我发表了题为《从十月革

命到一月革命》的演讲。在兰州市乃与全甘肃省，大约有十万人听过我的报告，后来我被选为群众代表，进入兰州大学的领导班子。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，我的父母与家人，都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，国家陷入了深重的灾难，民不遑生。我开始反对四人帮，最后被打成反革命。从一九八三到一九八八年，是我的黄金年，也是中国政治最开放的时期。我发表了《论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》的系列文章，并且在许多地方做报告。在这期间，我与叶铭汉、郑志鹏、陈和生等人成了好朋友。这些人，先后都当了高能所的所长，他们在许多方面给予我很大的帮助。可是，好景不长。先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，然后很快就发生了著名的六四运动。我参与并且拍摄了许多录像片，这很快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，于是有了逃离中国的惊险一幕。在三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不但被高能所除名，而且不能更新中国护照，成了一个无国籍的人。后来我移民美国，成为美国公民。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，中国发生了巨变。国民经济总值跃居世界第二，可以讲，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。“科学发展观”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，我也为中美两国的友谊与合作做出了贡献。其实，即使在美国的二十多年里我也经历了荣荣辱辱，这让我进一步深入了解美国社会真实的各个方面。我那风口浪尖的岁月告诉我，人类必须在相互学习中取长补短，这样，才能殊途同归，走向和谐繁荣的明天。

应该承认，总的来讲，我这个人非常幸运，在人生的关键或危急时刻，总是有贵人相助，尤其是女人。记得在一九六六年，我在尹家山的深山里“下放”，我的腿被狗咬伤，感染发炎，危在旦夕。是一位乡村老大娘细心照顾，才使我转危为安。一九六四年，我正在农村“四清”，这时正是研究生入学考试之时。“四清”队长糜丽英，破例让我回到上海去参加考试。一九八九年，我离开中国，是科学院的一位女士帮助我开了“出境证”，这才让我顺利离开。是吴秀兰教授帮助我找到了在美国费米实验室的工作。如果没有这些“女人缘”，我不能想象我的命运将会如何。我的感情生活也比较丰富多彩。我的初恋充满苦涩，



我的小说《初恋的阴影》，几乎被搬上银幕。我有过两次婚姻。第一次与一个开国将军的女儿衡宝，是她把我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解救出来。可是后来我与她离婚，人们骂我是“陈世美”，我想这也没骂错。我的第二次婚姻是与一位完全不同的女人刘莉结婚。如果说她们两个人一个来自火星，一个来自水星，一点也不夸张。一个从来没有进过化妆品店的门，一个不在镜子前化妆半小时出不了门。与所有的坏男人一样，我也有过几次婚外情。我翻出那时写的情书，真也充满激情。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，是当时那一页历史的一面镜子。

在我几十年的岁月里，我有幸与许多伟人结识。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坦伯格、杨振宁、李政道、丁肇中等人。尤其是斯坦伯格，他的人格魅力，给了我无与伦比的影响。我也有幸与许许多多成功人士结为朋友。例如潘国驹、吴秀兰、范曾、周氏兄弟、马晓晖等人。也有许许多多的朋友，他们也许不那么有名，但是，他们的行为，深深地教育了我，我会永远记住这些名字：保罗、莱因、尔娜、比尔等等。我不会讲一些有关他们的众所周知的事，仅仅讲那些我个人所了解的，令我感动并永远难忘的往事。他们的人格魅力，改变了我的人生。

最后，我会不可避免地提起我的兄弟姐妹。他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的姐姐吴复民是一个记者，她的文章影响了中国六十年代以后的许多重要事件。我的妹妹吴晓民是深圳特区的开拓者之一，是新中国访问美国的最早的记者与最早的美国荣誉公民之一。我的二弟吴新民，是中美乒乓外交的参与者，他与科恩的照片总是出现在中美外交历史的文章与报纸上。我还有两个弟弟吴基民与吴民民，他们都是电视工作者，吴民民还是第一个在日本NHK工作的中国人。他们还都是多产的作家。他们的成就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。

我希望我的故事，能够把读者带进真实的历史，能够让他们深入地了解历史，从而为创造新的历史，带来启示。